



中國的光明前途

韜奮

一 本身的力量

美國女作家及寫劇家卜斯女士 (Clare Boothe, 即美國著名雜誌 Time, Life 和 Fortune 的編者和出版家 Henry Luce 的夫人) 最近來中國視察, 途經香港, 在嶺南大學學生歡迎會中, 對中國有下述的幾句話:

「中國在我看來, 是世界上最令人興奮的地方。在世界上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中國人; 在潛伏中國最世界上最強最偉大的國家, 五分之一的世界是中國的; 這好像是一個令人難於置信的事實, 簡直是人們的想像力所難於把握的事實。在中國, 你們有着各種的原料——每一件可使中國強起來的東西。同時你們還有着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力。」(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8, 1941,)

這不是卜斯女士恭維中國的話, 實在是很客觀地說出了中國的真相。
中國地大物博人多, 實在是我們的祖宗留給我們以光明前途的基礎。我們一方面看到歐洲的小

國接二連三地受到納粹暴力的摧殘蹂躪，有的幾天亡國，有的簡直在幾小時就亡了國，其中原因固然相當複雜，但因為「小」得易被打光，却也是一個事實；一方面看到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雖以暴力佔了不少的土地，整整打了四年，越打越沒有把握；我們不得不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祖宗遺留給我們的基礎的薄弱，要寶貴這個光明前途的基礎，加緊發揚光大我們的這種「潛伏中」的偉大的力量，建立「世界上最強最偉大的國家」。

在「弱肉強食」的這個世界上，在暴力橫行空前的這個世界上，我們有着這樣優厚的基礎，作為我們繼續奮鬥的據點，這已是足以「令人興奮」的事實，使我們絕對不可妄自菲薄，但不僅如此而已，在法西斯及納粹橫行的今日，在民主政治不絕如縷的今日，在許多人為納粹霸王希特勒一時橫行無忌所掀動而歌頌獨裁政治的今日，我們却有着 國父中山先生遺留給我們的光芒萬丈的關於民主政治的遺教。國父對民主政治有着非常堅強的信心，他在民權主義演講中，曾經這樣指示我們：「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澆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怎樣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像袁世凱，很蠻悍的軍閥像張勳，都是終歸失敗的。」他對於人民參加政治的重要性，非常重視，他在三民主義演講中一再指出：「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政治有一個平等地方。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他認為民主政治是實行三民主義的鎖鑰，所以他這樣說：「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

義，和美國總統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是相通的。人民必要能夠治，才能夠享，不能夠治，便不能夠享；就是民有都是假的。」所以他又這樣說：「如果政治不良，在國家裏頭無論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在中國雖有一部份人一聽到民主政治，便會感到冷水澆背的不自在，甚至毀謗積極提倡民主政治的人，但是由於國父的遺教替中國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石，他們儘管用曲折折的論調反對民主，却不敢公然違背國父的學說和主義。在國父遺教領導下的中國，儘管有法西斯納粹橫行於外，少數頑固份子阻梗於內，我們深信中國是終於可以走上民主政治之路，發揮「在潛伏中」的中國的偉力，增進中國人民及世界人類的福利。

這不是我們的幻想，因為我們在物質在精神方面都有着優良而堅固的基礎。我們不要辜負了這優良而鞏固的基礎。

二 國際的有利形勢

歐戰的烽火是在一天天擴大蔓延起來，美國正在鬧着護航的問題，向着實際參戰的路程上邁進，遠東的日本也正在磨刀霍霍，準備趁火打劫。世界大戰的日趨擴大蔓延，固為人類的慘劇，但無論國際人士對於世界大戰的態度怎樣，解釋怎樣，對中國爭取獨立自由的神聖戰爭却是一致同情（所謂軸心國家當然除外），在參加世界大戰的各民主國家，在客觀上對於中國的作戰都出以支持和援助的態度。我們固然知道在德意日三國同盟宣布的前夜，曾有「遠東慕尼黑」的陰謀，可是由於中國的堅持不屈與日本進一步投入軸心的懷抱，英美對遠東都轉回於積極，尤其是英國對於日本的關係更尖銳化，在太平洋的防務也較前更加緊地佈置，對中國表示願與以更多的援助。對中國民族解

被戰爭始終採用援助政策的蘇聯，在四年來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動搖過，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

自從今年四月十三日蘇日中立協定簽訂以後，在世界及中國都引起了多少的波動，有許多方面都憂慮到該約是否要影響到蘇聯援華的問題。同時東京發言人更盡力宣傳蘇日中立協定對中國充占的如何有害。但在該約簽訂三日後，莫洛托夫即對中國駐蘇大使邵力子保證蘇聯並不因該約而改變對華的態度，並不因該約而停止對華的援助，據最近由陪都到港勸募公債的黃任之先生所談，最近蘇聯對華援助只有較前增加而未減少，可見在事實上蘇聯對於中國的確不因蘇日中立協定而受到任何影響。此外因蘇日共同宣言涉及「滿洲國」字樣，有人認爲這是等於承認「滿洲國」，但據上海英文「字林西報」及「大陸報」所載路透社重慶四月十八日專電，謂路透社訪員探得確息，邵大使與莫洛托夫會晤時，曾討論及最近成立的蘇日中立協定，並要求蘇聯當局闡明某某數點，尤注意於今後蘇聯對華政策，同時且對涉及「滿洲國」之蘇日共同宣言表示反對。莫洛托夫除向邵大使保證蘇聯對華政策始終不受中立協定影響，以及蘇聯政府今後仍願繼續援華外，關於「滿洲國」問題，也曾加以說明，據他表示，共同宣言中之採用「滿洲國」一字，係由於「缺乏適當代替名詞」，並鄭重指出在該宣言中對「滿洲國」一字會加括弧，由此可證蘇聯並不承認「滿洲國」之政權。由於事實發展的代表，蘇聯對於援助反侵略民族的一貫政策，並無改變，這在充占的中國當然是有利的。日本不但盡力宣傳該約對於中國充占的如何不利，同時因蘇聯對中國解放戰爭向採援助政策，且在援助中國的友邦中所助最多，（據去年十一月間英國「觀察報」"Observer"的報道，我國作戰以來，蘇聯對華財政物資的援助共達四億五千萬美圓，比美國多六倍，比英國多十七倍）所以

極望由此在中國能引起反蘇高潮，由反蘇而反共，由反共而內戰，妄想日本可以因中國不可能繼續作戰而實現它的願望。

日本的這種陰謀當然沒有實現。我們站在中國民族解放戰爭利益的立場，當然要爭取蘇聯更多的援助，而不願上日本的老當，引起反蘇的高潮。在實際上，蘇日中立協定簽訂以後，不但不影響蘇聯的援華政策，而且更促進了美國增加對於中國的援助，五千萬元平準基金的倡款，原於去年十二月即已談起，直至最近由於蘇日中立協定的刺激，才迅速簽字，便是一例。

當前的國際形勢，蘇聯固然支持並援助中國繼續奮鬥，英美亦利於支持並援助中國繼續作戰。這種有利於中國的國際形勢，是我們所當善為運用，以加強我們爭取更大勝利的力量。

三 我們的努力動向

從我國「潛伏中」的偉大力量看去，從國際形勢的有利條件看去，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的光明前途，已如上述。但是「潛伏中」的偉大力量要我們去掘發，去發揚光大，這是有待於我們的主觀的努力；有利的國際形勢也要我們去善為運用，開採加強我們的作戰力量，這也需要我們的主觀的努力。我們一方面須明白中國的光明前途已有着它的客觀的條件，一方面也須明白要能利用客觀條件以達到我們所要達到的抗建的目的。我們鄭重指出主觀努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明光明的前途雖在前而向我們招手，一線的光亮雖已在望，但是我們如呆立不動，或甚至向後倒退，那仍然是達不到的。

就整個民族的前途說，我們有着光明前途的信心，但同時我們却也不忽視當前亟待克服的種種

困難，例如國共糾紛的拖延未決，經濟問題的困難未除，廉潔政治的尙待建立，法治精神的尙待實現，反攻力量的尙待培成等等，都吸注了全國愛國同胞的嚴重注意。任何國家都有種種困難亟待努力克服，中國與別國比，並不見獨多，如與日本比，可說是少得多，有辦法得多，只須我們有克服困難的決心，不爲困難所克服，中國的光明前途仍然湧現在我們的前面。我們不應諱疾忌醫，也不應妄自菲薄。我們要就各人的崗位，向着抗建的共同目標而加倍努力。我們固然各有其本位的工作，但當前解決各種問題的基本條件，却在共同努力促成民主政治在中國的真正實現。上面曾經提及而在這裏仍值得重提的是 國父的這個重要指示：「如果政治不良，在國家裏頭無論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民主政治的實現不僅指真正民意機關的建立，俾得協助政府，督促政府，根據民意切實執行應與應革的一切措施，並指在當前即須切實執行約法及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最低限度人民權利的保障，例如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切實保障，人民不得被違法拘捕及須經法院公開審判等等的切實保障等，這種最低限度的人民權利必須切實的保障，然後才有反映民意推進政治改善的可能，否則只有官意而無民意，特務橫行無忌，人民吞聲飲泣，少數不肯官吏，藉口「國家至上」來實行「官吏至上」，無惡不作，即有賢明的領袖，賢明領袖即具有三頭六臂，亦難使政治上軌道。第一步我們必須認識民主政治的切實執行，實爲解決一切問題的樞紐，各方面都有了這種深切的認識，分頭努力促成民主要求的偉大運動，由此促成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中國的光明前途即將隨着迅速地展開，迅速地到來。

如何克服當前的經濟困難

千家駒

戰事到現在已經將近四週年，以一個生產力發展落後的國家抵抗一個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日本，我們的經濟居然能支持到四年之久，誰也不能不感謝我們祖宗遺留給我們這份地大物博的偉大遺產吧！誠然，這是值得我們每個人誇耀的：中國經濟潛在力量之偉大與中國人民克苦耐勞的精神足使我們支持這個長期的戰爭；支持到最後勝利為止。但是假如我們以此自滿，因此忽視了積在我們面前的經濟危機，甚至自欺欺人，故意掩飾目前嚴重的經濟困難，諱疾忌醫，不求克服，那麼，我們祖宗這份偉大遺產也有可能被我們所斷送，而最後勝利也將成爲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這種無條件的樂觀論是比失敗主義者還要危險的，我們今天必須敢於正視現實，不怕指出困難，研究造成目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在那裏，然後就其所以克服之道，這才是每個忠於民族解放事業者所應有的任務。

今天我們的經濟困難在那裏呢？這也不必談什麼高深的學理，或者請教研究經濟的專家，即執途人而問之，他也會告訴你是漫無底止的高漲的物價，以及由於物價高漲所造成人民生活的困難。而物價之中，漲得最驚人的又莫過於米糧價格。例如重慶的米價最近已漲至五百元以上（國幣）一石（合二百八十斤）；福州在淪陷前米價竟一度高至每市担一千數百元；曲江也賣到一元多錢一斤；桂林的米價在後方大都市中算是最底的，但也自三月底之每市担四十元漲至五月中旬之九十餘元，在一個月之內漲到一倍以上；湖南爲產米之區，而最近在湘潭一帶已有吃大戶的事情發生。從前經濟

部長翁文灝先生曾經寫一篇文章說：各地物價高漲並未影響到一般平民之生活，因為食糧價格漲得最慢，而據學者研究平民之食物費用占總支出百分之八十以上云。（大意如此，原文不在手邊）到了今天，翁部長的話顯然需要修正了，因為今天物價中漲得最厲害的正是食糧，因之受到物價高漲影響最大的也就是一般平民了。但是米糧價格爲什麼會這樣飛漲的呢？是由於生產之不足嗎？顯然不是的。以生產來說，近幾年後方年年是豐收，即以四川來說，去年雖非十足豐收之年，亦可當十足年之七八成，照理決不應該鬧糧荒問題的。再以其他省區來說，江西湖南爲著名之糧食產區，自不必說，他如貴州、廣西、雲南、浙江省等亦差可以自給。廣東雖爲一缺米區域，然湖南、江西、廣西之餘糧，亦可接濟。據中央農業實驗所對各地之農情綜合報告，去年（二十九年）後方十五省糧產約與前年相等，當十足年之七成收成，即以最審慎之估計，亦當達前年百分之九十五，可見去年下半年起糧價之高漲，並非由於生產之不足。以消費量來說，大後方的食糧消費量最近一年與前一年並沒有什麼區別，運輸的困難條件也沒有特別增加，所以今日糧價之飛漲，決非供給與需要之一般原因所可解釋。這裏面的癥結，就如蔣委員長所指出的並非天然的缺乏，而是人爲的原因所造成的。所謂「人爲的原因」，就是奸商的屯積居奇，富農地主的閉藏不賣，以及軍糧之不得其法的購買，通貨發行數量的增加等等。

然而這種種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嗎？顯然不是的，它裏面實包含着嚴重的政治問題。以奸商的屯積居奇來說，政府取締屯積的法令不可謂不嚴厲，行政院有「非常時期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屯積居奇」的專例，蔣委員長有手諭，真是三令五申。爲什麼不能收效呢？重慶大公報會明白指出：「關係

最大的恐怕是「奸官」，因為奸商係私人的資本，數目究竟比較要少，「奸官」利用特殊地位，其大批收買，巨量屯積，絕非奸商所敢觀覬的。甚至掃蕩報也不得不說：「現在做投機生意的人，是各界都有，異常的多，他們的力量遠超過一般人之上。這些人常和一般市儈狼狽為奸，屯積居奇，造成米荒，並且利用銀行押款辦法反覆買入大批穀米，操縱市價，甚至有時候，空盤賣買，欺詐取財，憑票交易，行類賭博。」這所謂「力量遠超過一般人之上」的「各界」的人，當然不是普通的「士農工商」，而是具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儘管有領袖皇皇的手諭和國民政府堂堂的命令，而米價之飛漲也如故，官商之屯積也如故。我們可以說，如果我們依然不能改變那傳統的「祇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作風，依然不能實行大公無私的民主政治，任何法令，結果亦不過等於零的白紙黑字而已。

再以富農地主之藏糧不賣來說，這亦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又是一個政治問題。幣值的低落固然是刺激地主富農齊願保存糧食不願儲藏法幣的一個心理因素，但如果我們在政治上能給濟明廉潔，同時又有很好的民衆動員，這種現象有什麼難以糾正呢！反過來，假使政治上是貪污不法，大家都在混水裏摸魚，那是不能單獨責備地主富農之屯積不賣的。正如戰後有發國難財到十八萬萬元以上，這又如何能責備一般民衆不節衣縮食來買救國公債？孔老夫子有句話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不從政治上根本改造，做個好榜樣給民衆看，而徒然想以婆婆媽媽的說教方式勸民衆不要囤積不賣，這自然是不會收效的。

第三是軍糧問題。軍糧的購買，照道理是不應該影響到糧荒，但今天軍糧購買的方式却大有問

題。首先是許多產米區域大量購買軍米時所定糧價與市價往往相差甚巨，這樣適足造成日人高價收買的可利條件。有時竟爲此而用封倉的辦法，因而更促成豪紳地主與奸商們的乘機活動。其次是由後方的駐軍以規定軍糧價格，自己購買，則問題更多，不但有糧價距離問題，而且具有購買數量之多寡問題。但是這種種也不僅是技術問題，同時還有經濟行政人事機構問題，人事機構不改進，軍糧的購買是不會得有合理解決的。

最後說到通貨發行的數量，這又牽涉到整個的財政政策了。通貨數量本來無所謂絕對的多寡，主要的看我們運用之合理與否？當戰事之最初二年，我們相信中國法幣發行的數量是不會怎樣巨大的，但自去年以後，則法幣發行額，因物價之不斷上漲，而日益增巨。截至最近爲止，通貨數量據我們估計當較戰前增加八倍以上。所增發的鈔票，雖有一部分流通在上海、淪陷區及海外，也有一部分窖藏起來，（現在已很少）但是在大後方都市中流通的自亦不在少數，尤其是因爲戰後大後方生產建設還不夠吸收這增發的法幣。同時戰後的財政手段又不能消滅戰後軍需的膨脹，以致大量的法幣發出後，就變成了游資而在商品市場和投機市場推波助瀾，興風作浪。游資的作祟可以說是造成後方物價飛漲之一重要因素；而大量游資之所以發生，則由於戰後財政政策始終沒有建立在「有錢出錢」的上面。發國難財者非但得不到任何的制裁，而且在事實上處處予以鼓勵。國難財愈積愈多，自然在商品屯積市場的游資愈湧湧；游資愈湧湧，物價亦愈高漲，物價愈高漲，則政府每月支出愈龐大，要借重印刷機器之處亦愈多；法幣發行愈多，自然發國難財者來源越容易。這樣輾轉相因，遂以造成今日物價飛騰，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局面。但這種物價高騰對發國難財者是絲毫不受影

響的；不但受影響，而且這正是他們發財的源泉。所以儘管一般市民叫苦連天，小公務員要改行拉洋車，沒有油可措的上校要自殺（見某報重慶通訊），但腦肥腸滿，一食百金，一夜千金者却有人在，他們更可以過其揮霍無度，荒淫無恥的生活。這就是目前後方極嚴重的經濟問題，同時也就是極嚴重的社會問題。

所以物價、糧價、貨幣、戰費這四個問題是一個問題的各方面，是戰時經濟病態之各種不同的表現。解決其一則解決其餘，一個不得解決則其餘的也不得解決。這問題可以歸結到政府有沒有決心實行適應戰時要求的經濟政策與財政政策。革命的經濟財政政策在原則上必須是自力更生的，而非倚賴別人，隨人俯仰的；是有錢出錢，合理負擔的，而非劫貧贈富，錦上添花的；是顧及國民經濟的原則而非單純財政收入為目的的；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依歸，而非個人第一，私產至上的；是公平周密，「皇子犯法，庶民同罪」的，而非假公濟私，便於「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具體地來說，橫在我們今天面前的經濟困難是：如何解決政府戰費籌措的困難而不必借助於印刷機器，是如何平抑今日一天比一天高漲的物價——特別是關係大眾生活的糧食價格，以安定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如何取締今日在商品屯積市場興風作浪的游資。這幾個問題都是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它的解決不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支支節節的。我們必須把握住問題的中心作根本的澈底的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政府能否採取有效財政手段來吸收在商品市場投機市場破壞物價的游資，並且根本防止增發通貨之再轉變為戰時的暴利；換句話說，就在政府能不能予發國難財者（不論其為奸商或汚吏）以應得的制裁。藉口能，則不但物價可以平定，屯積居奇的行為可以取締，而且戰費問題也

可因此迎刃而解。我們記得，馬寅初先生曾經對於作戰三年來的戰費負擔全部落在中下階級身上，而另一方面却造成少數的財神菩薩，表示其正義的憤慨，並且提議徵收戰時財產稅，自第四年起，戰費由發國難財者負擔，予中下階級以一喘息的機會，這實在是深有見地的見解，亦是解決目前經濟困難，改善人民生活之一具體的有效方案。可惜自馬寅初先生被「送到前方考察經濟」後，這種論調再也聽不到了。

說到這裏，我們知道這又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政策問題，而實在還是個政治改造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切切實實在政治上力求進步，不能實施民主政治，不能發揚民力，以民力來防止貧污，實現財政公開，那麼，一切的經濟改造又從何談起？一切的徵收暴利稅，取締貪污與浪費，以及改善人民生活，自然都會變成空談，最多也不過說說好聽吧了。革命的經濟政策必須建築在革命的民主主義上面，如果沒有革命的民主做保證，如果所有行政機構依然操縱在貪污手裏，如此而言經濟困難之克服，亦真所謂緣木而求魚而已。

所以我們知道今日的經濟問題關鍵還在政治，政治上沒有辦法，空言經濟抗戰是無補於實際的；蔣委員長最近告訴我們今後抗戰三分軍事，七分經濟，但如何才能達到七分經濟的目的，則仍有待於政治之改進。由於最近經濟困難之增加，物價高漲所引起人民生活的不安，我們不能不承認它已造成我們取得最後勝利前途之重要障礙。我們今天固不應悲觀；誇大困難，但也不應該故意無視事實，諱言困難，空喊勝利。我們必須敢於正視困難，把困難恰如其分的指出來，而尋求所以解決之道，由於我們這種困難，並非客觀上基本地存在着，他並沒有帶有不可克服的性質，而主要地

乃由於我們主觀努力之不夠，政治進步之趕不上戰爭形勢的發展，舊有的傳統的經濟政策之不足以適應今日戰爭客觀之要求。所以祇要我們能徹底改變過去的作風，實行大公無私的戰時經濟政策，而以進步的民主政治做它的保障，那麼，經濟危機是一定可以克服的。否則，空說「經濟抗戰」，其又何能濟補時艱呢！

一九四一·五·十四日香港。

國際新形勢

喬木

由於巴爾幹戰爭的結束，國際形勢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在未能進一步的分析這一新階段以前，我們先簡括的分析一下巴爾幹戰爭。

一

當二月初（八日）英軍攻陷里比亞的班加其，決定派兵援助希臘的時候，聯軍的估計以為這一舉在戰略上可以推進土耳其，使德蘇間的矛盾加深；在戰略上可以在巴爾幹創造一條東戰線牽制德軍。這一個作戰計劃成功的前提是第一，土耳其能動；第二，里比亞無事；第三，英軍源源增援希臘。

然而巴爾幹戰爭是失敗了，失敗的最大原因正是在：一，土耳其不動——二月十七日土耳其和保加利亞訂立了友好協定；二，里比亞有事——四月三日德軍奪回班加其；然而，三，聯軍不能大量增援希臘——據官方發表，聯軍登陸人數在整個作戰期間不過六〇〇〇〇人，在這當中，我們

將土耳其的問題姑置弗論，聯軍的疏忽很顯然的是在於：一，將保加利亞德軍的準備估計過低，以爲德國的攻勢不致於立即發動；二，過於輕視北非登陸的德軍，以致疏了里比亞的防衛。

四月三十日聯軍撤退完畢，五月三日德軍完成了全部希臘的佔領；巴爾幹戰爭結束了。

由於巴爾幹戰爭的結束，歐戰的基本形勢是改變了；三月以前（二月初）作戰的主動是在聯軍手裏的，而現在，作戰的主動是轉移到德義方面來了。

二

這一改變首先影響到歐戰本身的發展。

德國怎麼辦？

由於巴爾幹戰爭的結束，德國已經決定不移的控制了歐洲，看地圖已經可以知道：戰爭進一步的發展只有向歐洲以外的範圍展開；在這裏，德國的作戰方向，西有英倫海峽，西南有直布羅陀，東南有蘇彝士；德國究竟向那裏去呢？

有的說向西——侵英，有的說向西南——打直布羅陀，有的說向東南——打（近東和）蘇彝士；理論上，這三個方向都是可能的。不過事實上，不論向那一方面立即展開大規模的軍事攻勢都有問題。向蘇彝士勢不得不經過土耳其，問題在蘇聯；向直布羅陀勢不得不經過西班牙，問題在美國；向英倫海峽，問題在英國的海軍——這些問題都需要慎重考慮（對美和對蘇）和準備（侵英），絕非一蹴可幾的。

這樣，跟着巴爾幹戰爭之後，歐戰的舞台上又呈現出暴風雨快要來時的沉寂。在沉寂當中。希

特勒做兩件事：第一是控制近東（土耳其）和西南歐（法國西班牙）——準備戰爭；第二是發動和平攻勢，催眠美國。

五月四日希特勒發表國會演詞，在那裏他說：美國不了解德國的真意；不過，美國的參戰亦絕無濟於事，美國的援英是徒然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連希特勒自己也不得不看到戰爭可能是延長到一九四二年了——又是一個冬天，最低限度；千百萬歐洲的人民，難道是毫無動靜的可能嗎？

然而和平攻勢是愈來愈蒼白了，蒼白到連和平攻勢的發動者也不敢相信了——這樣德國不得不準備第二步的攻勢，首先是控制近東和西南歐。

四月二十四日，德土成立了一項三·〇〇〇·〇〇〇土磅的商業協定——這是他對於近東政治進攻的第一步；五月七日德法之間又成立了一項修正過境和減輕維希戰費負擔（從每日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到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的協定。巨大的紅軍的射影湯漾在韃靼海峽；因此，不管近東的形勢如何緊迫，我們不相信，德國會立即發動對土軍事。不過，那可憐的維希呢？在七日協定裏，德國已經向維希讓步了，維希拿什麼報答柏林？法國的軍艦？德軍過境權？敘利亞和摩洛哥？——這些問題只有將來的歷史才能解答。

其時，在還期間，德國的反封鎖（大西洋戰爭），無疑問的是將更加活躍了；這是德國侵英所必具的前提。

聯軍怎麼辦？

德國的弱點就是英國的優點。

邱吉爾在他的七日國會演詞裏說：「有人將希特勒比成拿破崙，蘇聯和西班牙在最近或將爲這一段歷史造一新頁」（七日倫敦路透電）。這是英國政略的核心。蘇聯關心土耳其的中立，德蘇之間可能因爲土耳其問題而發生戰爭；美國不能坐視西班牙的假道，美國可能因爲西班牙的假道德軍而立即參戰；這樣，東有蘇聯的牽制，西有美國的聲援——這不是一套雄偉的政略計劃嗎？

在戰略上，由於巴爾幹戰爭的結束，聯軍已經失去了一條反攻的跳板，而土耳其一被軸心所爭取，蘇聯士即有立即受兩面包圍之虞；爲彌補這一個缺憾，聯軍必須力爭土耳其，消極的爲保衛蘇聯士，積極的爲將來發動反攻。

這樣就產生了英國和伊拉克的戰爭。

五月二日英伊戰爭爆發，時至今已過一週，現在我們不必去分析英伊戰事的發展，在這裏起着決定作用的是土耳其，假如土耳其真能保持中立，很顯然的，德國的遠水是救不了伊拉克的近火的。

直至現在，土耳其保持中立；而且我們相信，它的中立還將保持下去。一個奇怪的現象！伊拉克分明是親德，而德國的軍隊又正是近在韃靼海峽的彼岸，爲什麼它不突破土耳其的中立，直下美索布達米亞平原？是的，這是這一次歐戰中的奇跡，德國的裝甲車可以在三日之內突破馬其諾，但是它不得不在蘇聯的射影前躊躇。蘇聯的存在限制了戰爭的擴大。

在土耳其保持中立的前提之下，德國的聲援伊拉克只能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發動埃及戰爭，牽制英軍的增援；一個是利用敘利亞的據點，以跳傘部隊援助伊拉克——這兩者都是在目前立即可以實現的。

我們不知道英伊戰爭的前途究竟怎樣；不過，很顯然的，英伊戰事的發展不但影響近東的戰爭，而且將影響到歐戰的發展，這裏決定着伊拉克是聯軍援助土耳其的滇緬路，還是變成德國火擊蘇彝士的前哨站；所謂石油問題還是其次的事情。

在這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第一，英國必以全力爭取伊拉克；第二，美總統已經宣布開放紅海（四月十一日），而且聽說美國的物資已經有了二十六船到達近東（五月三日華盛頓合衆社電）——這樣我們看到，未來的近東戰爭不但關係蘇聯，而且關係於美國（美國佔有伊拉克的煤油利益百分之二十三以上），亞力山大港已經是言如其質的世界的中心了：亞力山大港，西有德國的坦克車，東（南的紅海裏）有美國的商船，北有蘇聯——土耳其，這不是一幅世界戰爭的縮影嗎？

其時，我們不能不指出的是：雖然直至今日消極的聯蘇（翼蘇制德）和積極的聯美還是聯軍一貫的政略；不過，由於巴爾幹戰爭的結束，聯軍的政略重心已經轉移到美國方面了。

事有必至。

由於巴爾幹戰爭的結束，實際戰爭的舞台，已經轉移到蘇彝士的爭奪戰乃至一般的地中海戰爭方面來了；爲要支持這一戰，聯軍必須將它的海軍更加集中到地中海；這是聯軍在這一方面取勝乃至穩定形勢所必需的前提。可是另一方面，海軍長期的在地中海集中，勢不得不影響到它在大西洋